

營山文史

第二十七輯

營山縣志卷二

輿地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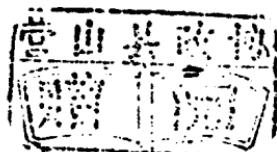
天下大一統也



聖德覃敷中外禔福山陬海澨並隸版圖懿爍乎一代
之隆軌也營邑昔隸巴國今屬果郡雙蓬簪秀九
曲流泉前擁翠屏琵琶之餘音宛在後排雲鳳芙蓉
之曉日常新東跨龍寶之雄儼成天塹西蹲封

营山文史资料

第二十七辑



政协四川省营山县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九月

足昭莫麗之鴻規而頃固封守之意亦於是寓焉
志輿地

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

川南新出内图准字(99)第116号

四川省营山县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工本费：9.00元

2011/37

营山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编辑委员会

顾问：李柏林

编审：王怀全 郭素华

主编：吴孟秋

副主编：张仲秋 李定国 周新全

编委：王定华 李定国 朱绍操

刘星耀 吴孟秋 张仲秋

周新全 姚白云 段炼

曹季侯 黄先彬

责任校对：朱绍操

谨以此辑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五十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五十周年
和
澳门回归
献礼

目 录

英名长留人间	刘星耀(1)
忆解放前夕对唐绍虞的统战工作	李道镛(15)
回忆营山解放	喻维庭提供资料 王金声整理(24)
回忆 1952 年营山“司法改革”运动	王能定(33)
长渠颂	段 炼(38)
旱地套作 低产变高产	阳 昕(66)
难得的 25.3%	郭玉泉(70)
从火力发电到水力发电的几件事	敬大奎(74)
营山公路建设述略 李崇葵 张映斗提供资料 黄先彬整理(80)
营山铁路建设	肖建伯(89)
飞速发展的营山邮电	白登茂 黄先彬(105)
蓬勃发展的我县广电事业	易炳荣(110)
喜看旧城展新颜	易新树(126)
回龙古镇建设新	黄开寿(134)
营山五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黄先彬(140)
营山新华织布厂	苏华东口述 黄先彬整理(149)
半个世纪营山教学改革的粗略回顾	李定国(154)
营山师训工作二十年	蔡定寿(169)
不断进取的营师附小	王学忠(191)
营山的村级医疗保健组织	阳道和(199)
忆农村大队保健站	李柏林(204)

- 合作化时期的农村俱乐部 郭玉成(216)
县城老年门球场建设纪实 刘致中(220)
复兴坝上话今昔 段荣泰(225)
农民齐赞吃住穿用新变化
..... 黄万富口述 曹季侯整理(231)
侄孙的婚礼 周新全(241)
我家炉灶的变化 黄先彬(247)
营山的票证 陶良先(251)
营山贯彻落实中央 14 号文件情况实录 李旭辉(259)
被采纳的建议 夏学序(267)
营山文史二十年 张仲秋(272)
翠屏职高十年 李柏林(289)
营山旅台同胞回报桑梓纪实 张友国(304)

英名长留人间

——杨伯恺传

刘星耀

赴法勤工俭学

杨伯恺，原名杨洵，字道融。1894年出生于四川营山县骆市乡（今骆市镇）杨家坝。父亲杨光普是一个诚实憨厚的农民，全家十口人，靠种地养蚕为生。杨伯恺从6岁进私塾，12岁考入营山云凤书院（相当于高级小学），1912年考入顺庆（今南充）联合中学就读。1916年在袁世凯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杨伯恺与同学一道走向街头，参加游行，向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演讲，与同学一起焚烧日货。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他与同学石琼得知这一消息便去北京考入法文专修班补习法文。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同年告别祖国赴法国勤工俭学，经过四十多天的海上漂泊，到达法国马赛。当时欧战结束不久，法国的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上学更难，只得在里昂找了一份工做，但不久也被解雇了。这时 he 去三德洞，同石琼、李富春、赵世炎、聂荣臻等进入制造火车头的史乃德工厂做工。杨伯恺同大家一样，一面坚持做工，一面刻苦学习。经过这一时期的劳动、学习锻炼，他逐步认识到发达的资本主义法国和封建落后的中国相比，表

面上虽有千差万别，但本质上都是黑暗腐败的。他感到过去对社会的观察认识空想太多，今后一方面应加强革命理论学习，一方面更应注重社会实践。在异国他乡，尽管杨伯恺、石琼等中国留学生专心求学做工，但这里的条件是极不稳定的，以后他们转到列夫来威铁工厂做工。1921年初，法国经济危机加剧，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大批失业，法郎贬值，生活费用暴涨，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生活困难，不少人挨饿。杨伯恺和王良翰、毛显珠、石琼、赵世炎等22人，联名写信给巴黎华法教育会，提出切实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工作、学习和生活问题的要求。当要求得不到解决，他们便决定召开学生大会，选出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等10人为发言人，于2月28日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实际形成了一次争取吃饭权和学习权的学生运动。1922年6月，杨伯恺被吸收为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党员，次年同石琼等一同转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与赵世炎、李富春等一同积极进行革命活动。

踊跃投入“五卅”运动

杨伯恺在法国学习、工作、劳动5年多时间，1925年3月回到祖国。首抵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取得了组织联系，并在上海从事活动。不久上海“五卅”运动爆发，社会各界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的暴行，全上海燃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熊熊烈火。杨伯恺踊跃投入了“五卅”爱国运动，白天奔走于工厂、学校，发表演讲，鼓动工人、学生坚持罢工罢课斗争，晚上赶写文章，刊刻、印发传单，揭露帝

国主义的血腥罪行。他在党中央创办的《热血日报》上，以“道融”的笔名发表了《是毒计也是蠢想》、《是叛徒不是强盗》、《谁是洪水猛兽》等文章，抨击帝国主义，驳斥对罢工的种种污蔑，鼓动工人、学生坚持反帝斗争，颇具影响力。

竭力推动四川革命斗争

1925年，四川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当年秋，杨伯恺奉命从上海回四川工作。当时党急需大批经过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干部，去组织发展工农运动。于是党中央决定在重庆由吴玉章、杨闇公筹办中法大学，培训革命力量。吴玉章任校长，杨伯恺任训育主任，云集一批革命学者任教，杨闇公、童庸生、冉钧等领导都亲自授课。吴玉章因工作经常不在校，杨伯恺便代行全面工作，致力于为党培训工农运动的骨干。

在这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省级党组织）成立，杨闇公选为书记，冉钧为组织部长，吴玉章为宣传部长（周贡植代行工作）、杨伯恺为教育委员，分管教育宣传工作。

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后，面临加强领导四川全省工作的艰巨任务。党要求学校加强对学生的培训工作的同时，也要配合各地的工作，将学生派出去参加组织工农运动。杨伯恺拟定学校教学提纲，组织教授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近现代史，讲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军阀割据残酷压迫人民、辛亥革命、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以及国民革命的任务、方针、性质、方法、步骤等专题，提高学生的革命觉悟和从事革命工作的能力，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杨伯恺从中共重庆

地方委员会成立到次年初改为中共四川省委，作为其中的领导成员之一，坚定地执行中央对四川发展工农运动、支持北伐的指示，坚持维护党的集体领导，发展四川的革命形势，坚持联合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杨伯恺分管党的教育宣传工作，紧密配合党开展的工运、学运、农运、兵运工作，提出指导各地工作的意见，派出一批批中法大学学生，到斗争的第一线去战斗，特别是他与重庆附近区县联系紧密，为推动学运、工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切实发展工农运动，建立发展党的组织，1926年初，杨伯恺同柏载鹏安排好工作，离开重庆回家乡营山领导发展营山农民运动。杨伯恺回到营山骆市乡，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宣传革命，物色进步分子，培训农运骨干，发展共产党员。他向中央写了两次报告，建立起营山第一个中共支部，在骆市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按照党的主张，他亲自撰写《农民协会章程》，号召农民们团结起来，踊跃参加农民协会，为求翻身解放，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在杨伯恺的领导和农会工作领导者陈同生、唐云松、郭经阶等的组织下，营山各地农民协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杨伯恺为提高农民觉悟，组织创办农民夜校。农民争先恐后参加夜校学习，晚间村村院院到处是琅琅书声。杨伯恺亲自为夜校拟写教材，他写的《打倒军阀除列强》、《农民四季歌》等夜课教材，深受农民喜爱。如“青的山，绿的田，灿烂的山河；美的衣，鲜的食，玲珑的楼阁；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等文，农民很快都能背诵。

杨伯恺领导的营山农民运动很快形成了浩大声势。农协会员特别精神，他们指着地主、土豪劣绅说：“你们还敢欺压

我们么？我们一定要算你们的帐！”地主土劣只得低下头说：“不敢！不敢！”农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活动更加广泛。腊月三十晚上，各农协会员以贴拜年帖子的名义，在那些官吏、地主、土劣的大门上，贴满了“打倒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穷人们要翻身要解放！”等标语口号，震惊了地主土劣，慌乱了反动当局。杨伯恺为减轻农民赋税，组织农会发表了《为减免田赋征税告全县农民书》，号召农民联合起来，为取消重税苛捐而奋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激发了营山农民强烈的爱国热情。当英帝国主义炮击万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时，在杨伯恺的领导下，农协会发表了声援万县人民、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抗议书，5000多名农会会员齐集县城示威游行，召开大会，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要求英国一切舰船退出川江，赔偿万县人民一切损失，呼吁断绝同英国的外交关系。营山农协会的这次反帝爱国活动，展现了组织起来的营山农民的强大力量。营山农运声势之大震惊全川。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在一次报告中，列举营山农运发展状况，说农协会员发展到8000多人（人数占全省第一），建立区农会22个，乡农会64个。杨闇公对大革命时期的营山农运大加赞赏，并给予充分肯定。

杨伯恺在中共重庆地委、中共四川省委期间，全身心投入组织发展四川工农运动，以他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认识水平，极强的工作能力，协同省委其他领导，不畏困难，深入群众，艰辛工作，发展了四川的革命形势，有力地支援了北伐。1927年3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同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组织重庆各界人士在打枪坝集会，声援南京人民，声讨美英帝国主义屠杀南京人民，制造“南京惨案”的罪行。数千群

众齐集打枪坝。杨伯恺同杨闇公、李筱亭、冉钧、周贡植、程子健等领导，不惧重庆反动当局力量的强大，准时进入会场参加大会。大会正要召开时，便遭到重庆反动当局王陵基、兰文彬有预谋的大破坏。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枪击、毒打、逮捕参会领导和群众，死伤数百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杨闇公、冉钧、漆南勋、陈达三等领导在“三·三一”惨案中遇难；杨伯恺遭枪击，头部受伤，流血不止，被一左派军人掩护逃出会场。顷刻，重庆、四川白色恐怖，国民党右派露出狰狞面目，对全川革命进行大破坏。杨伯恺虎口余生，离开腥风血雨的重庆去武汉。

不遗余力宣传革命理论

杨伯恺到武汉，上海“四·一二”政变已经发生，党中央迁到武汉。杨伯恺找到党组织，向党中央汇报了四川国民党右派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伤亡数百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使党中央了解了这一事件的真象。杨伯恺向北伐军干部战士作报告时，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敌人的残忍，北伐军干战无不慷慨。时值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杨伯恺作为四川代表出席了会议。此间他见到了留法同学、党中央领导周恩来，喜出望外，十分振奋，决心全力捍卫革命成果，将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当时湖南、广东、湖北的农运发展迅猛。杨伯恺对组织农民运动有丰富的经验，他为湖北农运讲习所培训的农运骨干讲了课，受到学员欢迎，得到农讲所主持人毛泽东的赞赏。

1927年7月，武汉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蒋

汪合流，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进行大屠杀。党组织通知杨伯恺“迅速转移去广州”。当他途经上海时，党组织又告诉他，广州起义失败，留沪参加文化界党的工作。作为一个在党内有一定资历的同志，他没有不同意见，就留沪进行战斗，任中共沪东区委下的文化支部书记。他以上海招商公学教师的公开职业，从事文化界党的工作。他踊跃参加了上海党组织开展的重大活动，反对上海当局的反动统治。当时上海党内受“左”的影响很深，在国民党进行大屠杀情况下，仍用公开斗争方式，组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搞“飞行集会”，致使反动军警乘机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镇压。杨伯恺不畏党内的强大压力，进行了坚决抵制。

1929年杨伯恺着力于研究、宣传革命理论，呼唤革命同志要学习马列著作，要学习哲学，要运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他在上海创办了“辛恩书店”，在他主持下翻译出版了大量哲学书刊和进步书籍。他自己翻译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一出版，便受到社会欢迎。杨伯恺在主持“辛恩书店”期间，翻译出版的进步书籍有：《财产之起源与进化》、《哲学原理》、《精神论》、《哲学思想集》、《学说与格言》、《思想启源论》、《自然之体系》、《哲学道德集》等10余部近200万字，促进人们去思考中国的未来，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他不知疲倦地工作，还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刊物。

坚持抗战，反对独裁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对华全面战争。8月13日，日

寇进攻上海逼近南京。淞沪会战一开始，杨伯恺就亲临前线慰问奋起抗日的爱国将士。上海失守后，他去到南京中共中央八路军办事处面见叶剑英，接受了做川军统战工作的任务。11月，他与陈同生一道去山西洪洞县，通过同乡好友、时任邓锡侯秘书长的张雪岩，会见了出川抗日的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杨伯恺谈了对时局的看法，转达了我党坚持抗日的主张，邓锡侯直接听到共产党人谈坚持抗日的真诚愿望，当即表示出愿意捐弃前嫌，同八路军共同抗日的友好诚意。此后，杨伯恺由西安去临潼，见到了周恩来、林伯渠同志，接受了回川工作的指示。

1938年初，杨伯恺回到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的罗世文、张曙时及车耀先、张秀熟、田一平等一起，为坚持抗战而共同战斗。杨伯恺此间应聘任成都协进中学教务长，他提出“读书不忘救国”，发动师生踊跃投入抗日运动。引导学生、青年读《新华日报》、《国难三日刊》、《星芒报》、《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大批学生毅然投身革命，奔赴延安。协进中学被誉为“陕北公学第二”。反动当局向他警告，逼迫他辞去教务长。杨伯恺在担任《华西日报》主笔期间，专为该报撰写社论。根据党的政策，呼吁团结抗战。他的篇篇社论和文章，无不催人拿出勇气投入抗战。他在发表的《世界大战的新阶段》、《现有战局下我们难关与出路》等文章中指出，“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力量得到加强，世界大战踏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必须抓住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使国际的和国内的团结空前坚实，才能有效地击溃人类最凶恶的公敌”；同时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日主张，指出“进步、团结、抗战是全国一致的心声，是中国出生入死的唯一法门，任何倒行逆施

都不能阻碍伟大民族向前发展的历史道路。”杨伯恺所写文章义正辞严，深受国统区人民青睐。杨伯恺在把握办报方向上，紧密配合《新华日报》进行宣传，使报纸贴近人们心声：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特派陈白尘、潘梓年到《华西日报》社，与杨伯恺共同研究，把报纸办得更有人民性、更有抗战特色。

杨伯恺在抗战末期，坚决支持国内民主呼声，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要求蒋介石结束一党专政。1943年9月，杨伯恺抓住国民党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的机会，连续发表社论，就政治民主建设，提出了一套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主张，揭露批判蒋介石所谓战时不能奢谈民主的谎言，抨击国民党御用文人诬蔑人民是“蠢蠢天生的群氓”、“无羁野马”、“有碍民主宪政实施”的谬论。他为《华西日报》写的《民主洪流不能遏止》、《怎样实现民主》等文章，像利剑投向反动统治，呐喊出了人民的声音。他为争取民主朝夕战斗，以鲜明的个性，仗义直言，毫不含糊，正气凛然，用犀利的笔锋，先后写出了《民主的理论与现实性》、《实现民主的实际工作》、《论民主团结方式》、《由民主与团结展开新局面》、《民主与民权》、《扫除团结的障碍》等上百篇社论和文章，鼓舞国统区人民坚持为民主而战。反动当局因此大为惊慌，对杨伯恺这位坚强民主斗士更为恼恨，必欲除之而后快。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接见民主政团同盟张致和时，关切地问到杨伯恺，赞扬杨伯恺写的论社和文章。

1944年，杨伯恺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委员、四川民盟宣传部长。这更有利于他在国统区为党从事统战工作。1945年4月，他亲自起草的由成都120人署名的《成都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在《华西日报》公开发表，

呼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反动当局对此极为恼怒，经常派“新闻人员”到《华西日报》捣乱并提出指控，大砍大杀代表民意的文章，使报纸来不及换稿，常常开着大大小小的“天窗”。不久，国民党政府公然查封了《华西日报》，一批特务进到印刷厂毒打工人，砸烂印刷机。

1946年4月，杨伯恺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和漆鲁鱼、田一平、李相符4人组成文化小组，负责成都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杨伯恺顺乎民意，为民说话，又筹办了《民众时报》，张澜出任社长，杨伯恺任总经理兼主笔。由于该报敢于为人民讲话，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揭露国民党的假民主，鼓舞了各界人民的斗志，打破了成都沉闷的政治空气，因而出刊不到3月便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并同时对杨伯恺提出警告，杨伯恺暂避居成都乡间土桥。此时，邓颖超同志特地到家看望杨伯恺，并转达了周恩来同志对成都工作的意见。杨伯恺更加坚定地担负起成都及四川的民主运动及统战工作，为实现中国真正的民主自由，走向光辉的明天而继续战斗。当年5月，《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禁止分馆一切宣传活动，扣押了9名记者和负责人。杨伯恺和田一平等通过各种关系四处奔走，直接面见省长，讲明实现国共合作要见于行动，讲明此事件的严重后果。经过据理斗争，使《新华日报》9位同志获释，顺利转回延安。国民党发动内战，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在昆明制造暗杀主张和平民主的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全国人民为之震惊。杨伯恺无比愤怒，无惧当局，与田一平主持了在成都召开的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当局制造这一血腥惨案的罪行，